

论清代经世文编的开山之作 《切问斋文钞》

暨南大学 张凯




-
- 乾嘉时期以陆燿为代表的“经世思潮”是明清经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代表着乾嘉学者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怀。
 - 《切问斋文钞》上承明末经世文编之余绪，下启晚清经世文编之风潮，是清代经世文编的开山之作，
 - 也是乾嘉古文选本中的重要体类。

一、陆燿的生平宦迹及经世实践

- 陆燿生于雍正元年（1723），卒于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。具体而言，陆燿三十岁中举人，三十二岁会试中明通榜，步入仕途。其为官经历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：
- 第一个阶段为京官时期，时间为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三十五年，这十六年间陆燿从内阁中书一直做到了户部郎中。
- 自四十八岁时，陆燿外放，调任山东，是其仕途的第二阶段。在山东任上十四年，陆燿从登州府知府做到了山东布政使。离任时，陆燿已经六十二岁。
- 调任湖南巡抚仅一年时间，陆燿因疾而卒，此是其仕途的第三个阶段。
- 陆燿的经世实践和功绩基本都集中于外任时期，因而《国朝耆献类征》将其划为“疆臣”。
- 《切问斋文钞》的最早版本为乾隆四十年刻本，此时陆燿正处于山东按察使任上，位于仕途的第二阶段。

二、《切问斋文钞》的选文构成和经世倾向

- 选文构成：
- **文章题材集聚——**（《切问斋文钞》共30卷，所选作家共计146位，文章共410篇，所选文章按照题材分为12类，分别为：学术、风俗、教家、服官、选举、财赋、荒政、保甲、兵制、刑法、时宪、河防。）**最看重风俗、学术、财赋、河防这四类文章。**
- **作家总体分散——**《切问斋文钞》中入选作家篇数最多的是：陆陇其、李光地、张履祥和姚文然四人，均为11篇；其次为方苞、王仑岳、王心敬三人，均为10篇；其余139位作家篇数均在10篇以下。作家择选上的分散性，正体现了以文为重、不以为人为重的编选倾向。以问题、题材为中心，广采博收，不讳遗民，不忌异见，正是此书的特点之一。

-
- **看重作家优长**——具体到单个作家，我们可以发现陆燿对每位作家的选录各有侧重。如刘榛和汪琬，《切问斋文钞》选入二人的15篇文章全部是风俗类，可见陆燿对二人此类文章的看重。其他如李光地，侧重于荒政和时宪；张履祥，侧重于风俗和教家；姚文然，侧重于财赋和刑法；田兰芳，侧重于学术和教家；方苞、徐乾学、朱彝尊侧重于风俗，王仑岳和李之芳侧重于选举，王心敬侧重于财赋，于成龙侧重于保甲，张尔岐侧重于学术。另外，河防类选录汪武曹（汪份）文章四篇，虽然从篇数上看较少，但独占四卷，不可忽视。
 - **头部作家充当意见领袖**——无论是在《切问斋文钞》的大范围，还是在前22个作家所形成的小范围之内，风俗、财赋、学术、选举、教家这五类文章都居于前五位。可以这样说，通过对这22位作家的选录，陆燿已经基本确定了《切问斋文钞》各类文章的基础格局，排名前六的这22位作家也在《切问斋文钞》中充当了意见领袖的作用，而剩余的124位作家则是观点的重要补充。
 - **从全书整体来看，《切问斋文钞》虽然不避当世，但仍然以前人经验为主；虽然不弃遗民，仍然以当朝意见为主；虽然兼顾在野，仍然以在朝举措为主。**
- 

- 经世倾向：

- 在《切问斋文钞》头部占比最大的四类文章（风俗、学术、财赋、河防）中，河防类文章显得最为特殊。不仅与陆燿**自身经历**密切相关，也围绕具体的**治河问题**自成体系，是陆燿有关水利经世思想的重要表现。文章内容则涉及治河、导河、河工、石工、要语、考辨等各个方面，简直是治理黄河的一座小型资料库。
- 关于河防文章的编排，陆燿也煞费苦心。河防类编排首先以徐乾学《治河说》、陈黄中《导河书》作为总论，继之以汤斌、王曰高、丁恺曾、嵇曾筠、张霭生等人所提出的具体治河措施，最后以汪份《黄河考》作为结束，有方针、有举措、有参考，条理清楚，眉目清晰。
- 徐、陈、汤三人总论治河方略，确定了堵不如疏的大政方针；王、丁、嵇、张诸人则深入治河的逐项举措，将方针逐渐细化，事无巨细，事事关照。最后四卷全收汪份《黄河考》，为治河提供了文献支撑，补足了河防重要的文献缺环。

三、《切问斋文钞》的编选目的、标准和体例

- 编选目的
- 陆燿将寻常古文所侧重的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一一否定，认为这三类古文虽然标榜“由文以见道”，实际上却是徒然“耗费精神”。因此，眼下的急切要务便是找到“明道”的最佳古文文体。
- 选取“有用之文”，借“经世”而“明道”，是陆燿编选《切问斋文钞》的根本目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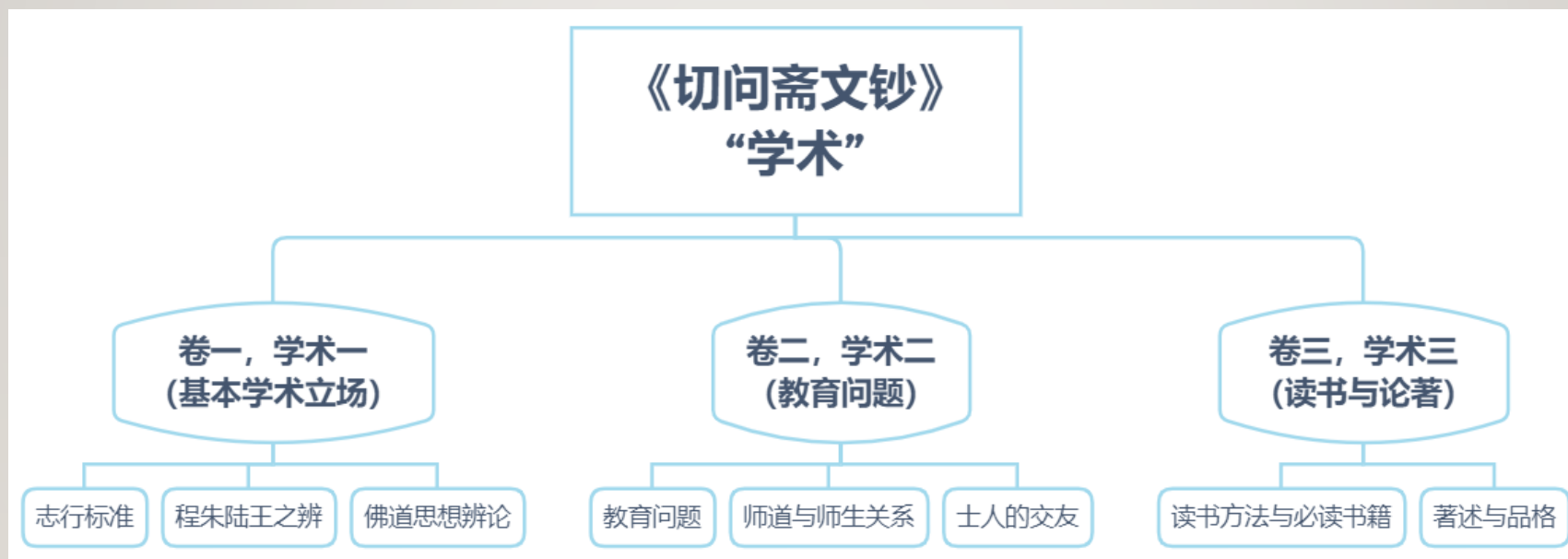
选文标准

- 在以“经世”原则的指导之下，陆燿确立了《切问斋文钞》选文的五个标准：
- 1.立言贵有用，以质言为主、不重文采，看重实际效用；
- 2.因时措施，两说并存，不立宗派；
- 3.不避遗民；
- 4.文章按轻重、缓急、大小排序；
- 5.以实用为主，不涉理论和艺术。
- 这五点相辅相成，均是以提倡“经世之文”为根本。

编订体例

- 其选择不以部类为限，而以实用为准。即使是说经之文，“惟切于婚丧诸礼，可即遵行者，始为采录。”如果“于经似有发明，而于事不免迂远”，则考虑到“既各有专集行世”，又于事无补，因而从略。另外，对于“一切论史、论文以及诗词字画之类，并从舍旃”。
- 在陆燿看来，文章并没有文体和部类上的尊卑，只有“轻重、缓急、大小之不同”，因此全书便按照“重要性”这一标准进行编排。在“重要性”这一维度的衡量下，不仅形成了《文钞》中以问题为中心的十二大类先后排列的格局，而且在具体的大类之下、于诸家同论一事中，也“微分次第”。

如“学术”类文章居首，其内部又按照“轻重、缓急、大小”进行了细分：



四、《切问斋文钞》的意义、价值和不足

- 开山与接续：

处清中期的陆燿在当时潜在的多元化学术观念的影响下，上承明末经世思想和清初实学思潮之余绪，率先将经世思想付诸行动并编选《切问斋文钞》，向下启发了嘉道之后“经世文编”之编选，可谓**承上启下**，进而导源了鸦片战争时期、洋务运动时期、戊戌维新时期、辛亥革命时期等重要历史阶段的经世思潮。

而且《切问斋文钞》的存在也是一种证明：证明自明而来的**经世思想并未中断**。换言之，无论是康熙朝程朱理学的勃兴，还是乾嘉时期考据学的鼎盛，**士人的经世传统并未断绝**。在汉宋之争、汉学风靡的表层之下，还存在着切切实实的经世思想。这对于扭转乾嘉学术研究中的认识误区是十分重要的。陈子龙的《皇明经世文编》虽然因政治原因于乾隆四十三年被列为禁书，但陆燿已于乾隆四十年编成了《切问斋文钞》，成功接续上了绵延而来的经世思想。

周积明先生曾说：“有关《切问斋文钞》的研究，不仅为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活跃提出了有力的证据，而且连接起了从晚明到晚清的经世文编长链”，此言得之。

四、《切问斋文钞》的意义、价值和不足

开创与示范：

陆燿改变了陈子龙《皇明经世文编》“人从其人，人从其代”的体例，以文章所谈论的**问题**进行分类，大大增强了经世文钞的实用性，改变了以往经世文编“知人不知事”的尴尬局面。并且《切问斋文钞》首次将“学术”这一类目纳入经世之学的范畴，将其作为经世之本。这两点改动都为之后的清代诸多经世文编所继承。从此意义上看，可以说陆燿的《切问斋文钞》重新发明了“经世文钞”这一体类。

这也无怪乎后来的杨国桢、李钦之等人直截了当地将《切问斋文钞》称为《皇朝经世文钞》或《经世文钞》了。

四、《切问斋文钞》的意义、价值和不足

破局与争衡：

从古文选本的角度讲，《切问斋文钞》的出现也丰富了乾嘉古文选本的类型，成为**清代经世古文选本的典型代表**。

由于陆燿的《切问斋文钞》重新壮大了经世文的力量，并且在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因而对当时桐城古文的生存环境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。这导致了**来自桐城派传统古文阵营的批评**，这其中以方东树的观点为代表。

陆燿的《切问斋文钞》作为清代经世文编的开山之作，引领了嘉道以降直至晚清的经世文风潮。在方东树看来，陆燿是清代经世文的“始作俑者”，因而方氏《切问斋文钞书后》对陆燿文章观念的批评也是对整个经世文派文学观念的批评，是传统古文家面对经世文挑战而做出的回应。虽然**桐城古文家否认陆燿《切问斋文钞》的文学观念，急于将自身与经世文划分开来**，但这正好说明了**乾嘉时期各类古文相混杂的局面**。正是从这一角度，陆燿的《切问斋文钞》成为乾嘉经世古文选本的典型代表，体现了**乾嘉时期古文选本的多样风貌**。这是《切问斋文钞》在古文选本史上的重要价值，也是其对乾嘉古文选本生态的价值所在。

四、《切问斋文钞》的意义、价值和不足

争议与不足：影响了学术求真

《切问斋文钞》的不足正在于其**仅强调经世**这一点所带来的弊端。陆燿完全抛开学术立场，不分汉宋、不别朱陆，不求真理，一以实用为标准。其编纂的《切问斋文钞》强调将学术直接服务于现实，只要切于“风俗之盛衰、吏治之得失、民生之疾苦”的学问即是经世之学，就应该得到推重和施行。客观上讲，以陆燿为代表的“实用派”经世思想的确对当时由汉宋之争所引发的弊端有所纠偏，**但也正由于其过分强调实用，忽视了学理上的“求真”，**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调和汉宋，更不可能取代汉宋成为另一学派。缺少了学理和立身准则支撑和规范的“**求实主义**”，有滑向“**庸俗实用主义**”的危险，这是其内在的弊端。

如果说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争是一场关于“真理”的学术革命的话，那么披着实用外衣的经世思潮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，它消解了有关“真理”讨论的意义，这也可以看作是乾嘉时期汉学对于理学学术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。

请各位专家赐教